

2301

山城文史資料

第十四輯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少城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二〇〇一年九月

成都

少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成都市江汉路222号 610031）

内部准印证川成新出内字(2001)第0424号

成都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厂址：成都市文家巷

开本32 印张5·5字数118千字

目 录

成都市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收获·····	朱章义 张 擎 (1)
成都解放的一段珍贵史实(下)·····	刘 明 王克诚 王竞生 (8)
邓柯渡口造船记·····	王 涛 (17)
记参加市委统战部开办的政治学校学习生活·····	米庆云 (20)
成都“社联”五十年·····	王大炜 (24)
筒车巷四号的一段往事·····	赵晚珍 (31)
成都市西城区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况·····	刘迪野 (35)
棉纱、棉布及主要针棉织品统购统销情况的回顾·····	戴崇新 (39)
日月企业的改革发展之路·····	万郁文 (54)
建国五十年来四川农业生产资料的发展和变化·····	刘中柱 (59)
成都名优小吃琐记(续)·····	熊志敏 曾成志 王安明 (64)
天府广场的璀璨明珠 ——记新移建的皇城清真寺·····	优素达·达鹏贵 (69)
市属中学下放到西城区的片断回忆·····	潘清雍 (77)
成都中学体育教材的发展和改革纪略·····	思品端 (82)
金马街小学的办学历程·····	张志英 张崇荣 (85)
青羊区体育场馆的过去与现在·····	范裕臻 (89)
京剧在成都(下)·····	刘钟灵 (94)

瞻仰“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联想

——追忆同志会副会长张澜革命事迹…………… 张慎沅 (100)

赵朴初四游峨眉山…………… 李豫川 (104)

忆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片断…………… 夏详烈 (110)

维护真理 正气凛然

——记马宗融先生二三事…………… 肖慕良 (115)

洒向人间都是爱

——记省政协委员、成都市名老中医刘吉明

…………… 刘兆荣 丁晨滨 (118)

体育教育家向志均逸事…………… 曹 丹 景 明 (124)

石人坝的由来…………… 赖正和 陈继铭 (128)

成都府南河上的园林景观——雅文化园…………… 王安明 (131)

抚今话昔祠堂街…………… 曾广文 (136)

锦里少城行业记街(竹枝词)…………… 何韞若 (140)

“少城”风情一瞥…………… 李定一 (146)

成都驻防八旗满蒙姓氏查考…………… 赵宏枢 (149)

福康安在成都的轶事…………… 周少稷 徒 彭 (155)

解放前成都“人市”…………… 徐稀星 (158)

抗战快餐…………… 刘西源 (162)

老成都的栅子…………… 周上明 (166)

成都市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收获

朱章义 张擎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是2001年2月8日新发现的一处商周时期遗址。由于该遗址在机械施工中就出土了1000多件与四川省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物相似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因而引起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研究。兹将金沙遗址发掘情况简介如下。

一、金沙遗址简况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郊，距成都市区中心约5公里，北邻摸底河，与黄忠遗址（商周时期的蜀文化遗址）隔河相望，东临青羊大道。遗址面积数十万平方米，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巴蜀文化中心遗址。经勘探和发掘已确认出土重要遗物的遗址中心区面积约10000平方米。考古发掘工作从2001年2月中旬开始，到7月底止，已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掘深度约1.3米，约当商末至西周时期的第8层。

遗址中心区域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化层多，堆积厚，达4-5米，这在成都平原是十分罕见的，从现有断面分析，金沙遗址中心区域的文化层至少可分16层，目前已发掘至约当商末至西周时期的第8层；二是遗迹现象和遗物极为丰富，在机械开挖的剖面上至少发现三个埋藏有大量象牙、玉石器和铜器堆积坑（暂定名），在发掘过程中又发现了大面积的獠牙、鹿角、玉石器、象

牙、美石和陶器堆积，成片的倾斜放置的石璧、石璋半成品堆积等，已出土金器、玉器、铜器、象牙近2000件；三是地层中出土大量的玉石器、青铜器、象牙等遗物，在已发掘的探方地层内出土了约800件器物。综上所述，金沙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风格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物相近，出土陶器也具商周时期特点，其时代约当商周时期，是一处典型蜀文化遗址。遗址中心区域的性质可能和祭祀有关，性质的最终确认尚待发掘与研究。

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简介

至2001年4月底，金沙遗址已出土玉石器、青铜器、金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

金器 数十件。器类有金王冠带、金面具、圆形鸟纹金箔饰、人形金箔饰、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盒形饰等。金面具高约5厘米，眼、口镂空，其造型风格、装饰方法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相似。金王冠带用金条锤打而成。其上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都为鸟、鱼、箭和人面图像的组合。图案的造型、内容，包括很多细部装饰都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出土的金杖相同，反映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文化渊源关系。

青铜器 近500件。器类有铜立人像、牛首、铜鸟、铜瑗、铜璧、铜眼形饰、铜眼泡、铜戈、铜铃、铜挂饰等。铜立人像高20厘米，立于座上，双手握于胸前，可能是一大型铜器的配件，其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近。牛首、铜鸟、铜瑗、铜璧、铜眼形饰、铜眼泡、铜戈、铜铃、铜挂饰等小型青铜器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小型青铜器基本相同。金沙遗址目前仅发现少量的尊等礼器、异形器等大型青铜器残片，预示金沙遗址将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铜器。

石器 200余件。器类有石矛、石璧、石铤、石斧、石璋和石雕

像。以石跪座人像、石虎、石蛇、石龟等石雕像最具特色。其中石跪座人像高17-25厘米，呈跪坐状，长辫及腰，双手反缚于腰间。石虎高15-22厘米、身长18-28厘米，呈半卧姿，昂首，张口，头部刻有纹饰，口内涂朱砂，表现出虎张开血盆大口的姿态。

玉器 近500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十分丰富，多为礼器、工具、兵器，多无使用痕，应是祭祀用品。玉器的器类有玉琮、玉璧、玉璋、玉圭、玉牙璧、玉瑗、玉戈、玉矛、玉剑、玉钺、玉戚、玉刀，玉铲、玉斤、玉斧、玉铤、玉凿、玉凹刃凿形器、玉镯、玉环、玉贝形饰、玉珠、玉圭形器、玉牌形器、玉异形器、玉箍形器及玉料等。经肉眼观察和初步鉴定，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绝大部分属透闪石软玉类，其它仅有少量的阳起石玉和蛇纹石玉等。其中以玉璋、玉凿、玉瑗、玉凹刃凿形器为主。

我们知道，从玉料到雕琢成玉器，一般都要经过选料、开片、设计、打磨、钻孔、雕刻和抛光等多道工序，金沙玉器当然也不例外。

切割：金沙玉器的切割主要有锯切割和线切割二种。锯切割主要适用于器型较大的遗物。大型玉璋的表面一般都残留有一个台面，是切割玉料制作玉璋的坯体时遗留下的痕迹。从切割时留下的痕迹可以看出，切割是从玉料的两侧分别向内切割，一次切割的长度达到50-80厘米，最长可能在100厘米以上，切割的深度在10厘米左右。这种切割法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两个切割面很难在同一水平面上而留下一个断面，打磨时也不可能将这些断面完全磨掉，从而留下了完整的切割线，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切割技术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切割的末端一般都非常平直均匀，切割口不呈“V”字形，加之切割的断面非常小，不可能是用竹片或石片之类的切割工具，应是采用青铜质的长条形片状工具，切割工具的厚度在1毫米左右，反映了金沙遗址制玉工艺的水平非常之

金沙玉器除大量使用锯切割外，也使用线切割，这种方法主要用于小型器物的切割，其特征是切割线呈抛物线，金沙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线切割标本。

钻孔：钻孔工艺在金沙遗址中运用十分广泛。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发明了用石锥、石钻进行钻孔，到良渚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利用绳或皮条拉动钻头高速运转进行钻孔的工艺。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的钻孔不但运用在大小不一的各类玉石器上，而且在石雕像中也大量使用。根据钻孔上残留的痕迹判断，钻孔主要有实芯钻和空芯钻二种。

打磨与抛光：金沙玉石器的打磨与抛光可能有三道工序。首先是在坯体制作之后进行初打磨，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相关的打磨工具，可能是用较为粗糙的石质物加上琢玉砂进行打磨；然后用细腻的硬度较高的磨石加上琢玉砂进行第二次打磨。在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质感细腻的玉磨石，表面十分光滑，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观察，玉磨石表面磨擦痕多在一个方向，磨擦产生的痕迹都非常细，也很浅，应是在打磨玉器的精加工时使用的一种工具；最后在玉器表面用皮一类的软质物进行抛光，这在其它考古学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中也广为应用。

雕刻：在玉器表面雕刻各种纹饰是玉器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从金沙遗址已出土的器物看，雕刻工艺有透雕、浅浮雕、阴刻和微雕等。

三、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金沙遗址出土的多节玉琮，特别是有兽面纹和微雕的多节玉琮，与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非常相似，甚至有学者认为与良渚玉琮相同，难于区分；也有学者认为与良渚玉琮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形似而神不似，不是良渚文化的遗物。我们认为金沙遗址出土

的这一件多节玉琮和玉凿、玉镯（箍形器）等遗物与良渚文化的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金沙遗址与浙江良渚文化的关系尚需深入研究。

金沙遗址中出土的玉钺、玉戚、玉戈等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的同类物相似，说明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周武王伐纣，蜀是周的盟国之一。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征蜀、伐蜀的记载，金沙遗址出土遗物多实物资料上证明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

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与越南出土的玉器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反映出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东南亚地区亦有交往。这在古代文献中也能找到证据。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可见，当时巴蜀的商品已远销到孟加拉地区。又《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记载了公元三世纪中期蜀王子征服交趾，称安阳王一事。我们认为商周时期的蜀国和现东南亚地区可能已有往来。

四、金沙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

金沙遗址之所以引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金沙遗址的发现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1、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其重要性完全可与广汉三星堆遗址并驾齐驱。一方面，金沙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风格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礼器相一致，表明成都金沙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关系，两遗

址的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另一方面，两遗址又各有特色，金沙遗址出土的丰富多彩的金器在全国极其罕见；玉器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且十分精美；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数量众多的石雕像在国内十分罕见。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极有可能加深并改变对三星堆祭祀坑的认识，解决很多巴蜀文化的未解之迷，推动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

2、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沙商周遗址是本世纪初我国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之一，填补了四川省、西南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多项空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全世界都十分关心的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3、金沙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的历史和成都市城市发展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应是商周时期蜀王的重器，再加上其北部黄忠遗址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群及周围其它重要遗存的发现来看，金沙遗址很可能是商周时期一处大型古蜀文化中心遗址，是古蜀国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可能是古蜀国的都城之一，是目前已知的成都最早的城市，这又将成都市的建城史从距今2300年提前到距今3100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成都市旅游业提供一个新热点，是新世纪成都的一大文化品牌，对它的研究与开发有利于成都市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符合省政府、市政府在新世纪将四川省建设成为旅游大省、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

五、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极为关注

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经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后，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前来视察工作的中央、省、市领导，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王汉斌，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省人民政府省长张中伟、省人大主任谢世杰、财政部部长项怀城、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子彬、省委副书记席义方、成都市委书记王荣轩、省委秘书长李崇禧、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昌达、李进、省人大副主任徐世群、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李春城、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维义等。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宋新潮、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也专程到金沙遗址指导工作。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为团长的香港西部考察团、台湾宗教代表团也专程到工地参观。各级领导对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均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到工地参观指导工作，认为这是21世纪初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外的新闻媒体中掀起一股强劲的金沙遗址旋风，中央、省、市各级新闻单位和国内外的一些新闻机构及各网站争相报道，使这项考古工作的社会效应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成都解放的一段珍贵史实（下）

刘明回忆 王克诚 王竞生整理

策反城防司令 维护地方治安

根据全国时局的变化，我们及时召开全组会议，认真分析了成都局势：在我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残留成都之敌，大多数已丧失战斗意志，争取敌军成建制起义或投降的条件已经成熟。分析会上大家形成共识：目前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主动出击，即以驻成都敌军整个后勤系统为对象，全面开展形势宣传和政策攻心，促其成建制起义。

会后，我们以中共地下党名义，把近期全国形势和我党我军对待蒋方人员的政策打印成文，秘密发送给敌军各个单位还没逃走的头目，并要求他们权衡利害，选择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保护好单位的一切公有财产，待解放后，我军将按功过大小政策兑现。

密信发出后，返回的情报表明，敌人营垒中浮动不安的情绪有明显稳定，找我方表态愿意立功赎罪的人接踵而来。

在12月中旬，因我军尚未完全对成都形成包围，一些坏人又嚣张捣乱起来，敲诈勒索，伤害人命，社会治安更加混乱。

在这重要时刻，我向同志们提出了一个冒险计划，即单身前访敌城防司令官，借他的力量平息骚乱，稳定社会。我话音刚落，同志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并说成都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到敌人窝里去十分危险。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我进一步说明了我的根据和分析。简

单地说，单身密访伪城防司令，必须把握两个问题：一是城防司令部有无力量平息骚乱；二是城防司令是否听我们的规劝。而这两个问题，我已从城防司令手下一高级助手（此人是我军校时的同志，又是山西老乡）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

伪城防司令叫曾庆集，四川安岳人。早年曾在美国骑兵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当武官7年。抗战胜利后，提升为上海港口少将司令，专门负责美国军事援助事宜。后因人事不和被罢官。由于他熟悉四川情况，通过地方势力活动，于1949年6月，才被委为“第44补给分区少将司令”，而此职权势不及港口司令，平时在言语之间不满情绪常有流露。此时，国民党主力被歼灭，权贵们纷纷逃往台湾，他被留在成都无人过问，更是惶恐不安。

当时，曾手下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不久，重庆的第4补给区、西安的第7补给区也撤退到成都，各有一个警卫营。曾以东道主名义，把3个警卫营合并成立一个后勤系统警卫团，归其指挥。之后，曾乘成都混乱之际，以这个团为基础，把分散各处的保安团收编成两个团，也归其指挥。另驻成都的一个宪兵团，也划入其系统。这3部份兵力约为6000人，而曾对外号称是一个军，自称军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年12月中旬，曾自行成立了“成都城防司令部”，自任司令，宪兵团长郭某担任副司令，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约法”。城防司令部成立后，曾、郭对兵力部署作了分工：宪兵团负责城内治安，其余几个团分兵把守4个城门和近郊，曾坐镇市中心司令部。

通过上述分析，大家认为：曾的实力是可以维持成都秩序的，问题在于曾的政治态度如何？是否听我们规劝？基于以下三个理由我认为曾不至于翻脸。一是10月1日新中国已宣告成立，我一

野、二野两路大军已逼近成都；二是曾非蒋军嫡系，在国民党内部遭排挤；三是把我扣起来或杀了，他个人也得不到丝毫好处，而解放后我党我军肯定会找其算账，何苦出此下策。我在介绍分析了曾庆集的情况后，又强调了密访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经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后，我即提出密访曾的具体方案和对策。决定当晚由我同李子才二人各带一支枪前去，我离开后由高怀廉同志负责情报小组工作，并作两手准备：若万一我俩回不来，被扣留或被杀害，情报小组全体成员彻底隐蔽，停止活动。杨、石两同志仍以秘密方式继续与各单位保持适当联系。我军进城后，由高负责向上级汇报情报小组随胡宗南部进入成都后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处理好善后工作；若密访成功，城内秩序由城防司令负责，出现骚乱以武力制止。同时，我即出城到前线向部队首长汇报，争取我军尽快入城。

散会后，我把高叫到一边，介绍了他需要掌握的情况，并将情报人员和情报关系名单等秘密资料交给了他，还将经费、账目等都一一作了交待。

当晚黄昏过后，我穿着伪军装，带着李子才乘车来到位于东城根街与金家坝交汇处的城防司令部。我即掏出一张印有刘本厚姓名、西安绥署上校联络参谋职务的名片，交李递给卫兵，卫兵过目后，马上送进门内值班室，很快出来一个自称是王副官的中尉军官。

我说明来意后，王副官对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院，两旁耳房大概是办事机构，此时，电话铃声、打字机声轧轧作响，人员进进出出。中庭是个大会议室，王安排我们坐下，即去向司令报告。几分钟后，王出来说，司令有请，把我们引到后院上房门口，一个勤务兵掀起门帘让我们进去。

坐在写字台后的一位身着美式军装的少将缓缓挪开座椅站起

来，看上去约有50岁左右，中等个头，面部白皙，戴一副金丝眼镜，不用介绍我就知道是谁了。我即近前向他行了军礼并叫了一声“曾司令”。曾斯文地伸出右手不冷不热地握了握我的手，左手拿着名片看了一眼说：“喔！刘参谋，请坐！”

我坐定后，王副官、李子才及那个勤务兵都退出上房。我看无人，便先开口说：“我这个不速之客，曾司令是不是有点意外？”

“不，不！你老兄是……？”曾言不由衷地顺口支吾着回答，一面在揣摸我说话的含义。

“我是中国共产党西北局派到成都工作的代表（这是我们一时权宜这么说的），有紧急情况要和你面谈。”我提高嗓子严肃地说。

曾一听，先是一愣，随即后退半步，拉长嗓子低声“啊——”的一声睁大眼睛盯着我。但他情绪很快平稳下来，语气很不自然地说：“噢，失迎，失迎！不知老兄有什么见教？”

我开门见山地对曾说明了来意，并向其提出了两条明确要求：第一，成都解放之前的过渡时期，作为地方主管，有责任保护好国民党后勤系统遗存的一切物资财产，因为这是人民的血汗，不得损失、丢失和私分。第二，现在我已向你公开了身份，我和我的同志们的人身安全，你必须全部负责。若能按我们的意见执行，解放后，我们将按政策对你过去的罪恶既往不咎，并论功行赏，给出路。

为了引起他足够的重视，我又指出，现在时机紧迫，我大军即将进城，失去机会，你的命运就不由自己掌握了，你要当机立断。接着，我又向曾简要介绍了全国军事、政治形势。

在我说话时，注意观察了曾的表情：他一会儿皱起眉头面显难色，一会儿低头在想什么，似乎心情起伏不定，思想斗争激烈，但始终没有翻脸为敌。

等我说完话，他一反刚进门时姿态，亲自过来给我泡上热茶。然后，搓搓手坐下来以略带激动的语气说：“刘代表，你老兄刚

才的话真是金玉良言，给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完全接受，完全照办。不过兄弟我手下兵力有限，万一哪里照顾不周，还望老兄多多原谅。”接着，曾发泄了一通对国民党不满的话后，又说：“目前成都正处于混乱中，为了不出意外，咱们今天的谈话，要严加保密。明天我派两个心腹归你使唤，有事情就叫他们去办。我尽快把司令部的电话给你接通，还可随时在电话上谈，这比较方便。至于你们的人身安全，兄弟当然负责，我马上选调一个步兵连，担负你们的驻地警卫。”

我站起身来和曾第二次握手，向他表示友谊和感谢。随后我们又坐下，继续商谈了若干工作中的细节问题，交谈融洽。我怕家里同志们担心，即告辞，曾派车送我们回到四圣祠医院。

第二天一大早，城防司令部派胡、黄两参谋带一连部队来，说保护我们。我要高怀廉同志去安排警卫部署事宜。那天以后，医院里的病人就转往他处，门口设了双岗，院内装了一部电话机，内外通讯很快勾通了，医院就成了我们的临时指挥所。

那天下午，我派杨开元同志陪同曾庆集到几个后勤单位去视察，一方面介绍相互认识，另一方面告诉这些单位遇到坏人捣乱制止不了时，即向城防司令部报告。

直至成都解放，曾的态度都是认真负责的，成都解放后，曾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

赶赴前线接头 迎先遣队入城

不久得到情报，经过激烈战斗，我第一野战军18兵团部队已经进至新都县城。为了尽快把城内情况报告给部队首长，我决定高怀廉同志随我一道出城与我军接头。

成都到新都30多里路。城内是城防司令部的部队，城外是国民党正规军驻防，再向北才是解放区。通过这一防区，若被挡住